

阴阳往来 定乱分立

——《周易外传》泰否卦义发覆

张永衡

摘要:王船山在《周易外传》中对泰否二卦作了不同于前人的阐释,他认为泰为“定”之意,符示天下得治;否为“乱”之意,代表天下失治。在阴阳轮转、显隐更替的视域下,他指出泰卦之“小往大来”即乾阳滋长而坤阴消退,否卦之“大往小来”即坤阴滋长而乾阳消退。在泰卦安泰得治之态势下,君子应该在明君子小人之辨的基础上积极有为;而在否卦否乱失治之态势下,则应该俭德避难、全身保道。王船山对泰否二卦的诠释发前人之未发,既有对传统解释的继承和发展,又蕴含了他对历史时势和个人境遇的真切领悟。

关键词:《周易外传》 王船山 泰卦 否卦

作者张永衡,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

《周易》中的泰否二卦言辞简洁、意蕴深厚,符示着阴阳往来过程中天地通泰与否乱的情态。泰卦乾下坤上,否卦坤下乾上,二卦卦象直接体现了天地乾坤往来交通的格局,因而备受历代注家的重视。一般来说,易学史上对泰否二卦卦义的解读都从阴阳的“交通”展开,但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却在《周易外传》中另辟蹊径,别立新说。本文不揣鄙陋,对船山《周易外传》关于泰否二卦的诠释加以分析,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泰否卦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船山易学的认识。

一、“通治”与“闭乱”:易学史上对泰否卦义的诠释

按《周易》卦序,泰否二卦分别是第十一卦和第十二卦,泰卦卦辞曰:“泰:小往大

来,吉亨。”否卦卦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泰卦和否卦既互为错卦,又互为综卦。《序卦传》云:“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由此看来,“泰”为“通泰”之义,而“否”为“泰”之反义词,即为“否塞不通”之义。泰卦《彖传》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大象传》曰:“天地交,泰。”否卦《彖传》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大象传》曰:“天地不交,否。”由此可见,《彖传》《大象传》和《序卦传》都将泰否二卦的基本含义理解为“交通”与“闭塞”。天地交合,阳施阴化,大千世界就能够万物化生、欣欣向荣;天地闭塞,阴阳不相往来,自然的造化就会停止,生机就会凋敝。泰、否不仅象征着自然层面阴阳之气的交通与否,而且象征着社会的得治与否乱。刘向云:“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1]1943}泰卦《彖传》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否卦《彖传》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周易》中之乾卦为阳,象征君子;坤卦为阴,象征小人。同时,一卦之下卦为内,上卦为外。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则君子之道得以亨通,政治活动协调有序;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则君子之道闭塞不显,政治活动混乱失序。

由上可见,《周易》经传在展开对泰否二卦的诠释时,无论是自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其切入点都在于“通”,同时二卦所符示的亨通与否又和卦辞所提示的大小往来有密切关系。《周易》中之“大”为阳、“小”为阴,因此“大往小来”就是阳往阴来、“小往大来”就是阴往阳来。问题在于卦辞所说的往来是向何而往,自何而来?由于历代易学家对泰否之通闭及其缘由的理解有所差别,所以其对经传中之大小往来的注释也稍有不同。总的来看,对此问题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阴阳消息的角度加以理解,即将“通”理解为阳进阴退、乾阳将兴的“亨通”。《周易集解》引汉儒虞翻言:“阳息坤,反否也。坤阴拙外为‘小往’,乾阳信内称‘大来’。”^{[2]163}虞翻此处乃是从阴阳消息的角度诠释泰卦,乾阳息于坤阴之上而促使坤阴消退,当乾阳息到三爻之时即成泰卦,所以虞翻说“阳息坤”。“拙”即“屈”,“信”即“伸”,虞翻之意乃是在乾阳息于坤阴之上的过程中,阳气逐渐伸张而阴气逐渐收缩,在卦象上表现为阳爻增加而阴爻减少,即所谓“小往大来”。在解释否卦时虞翻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阴消乾,又反泰也。……阴来灭阳,君子道消……阴信阳拙,故‘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与比三同义也。”^{[2]173}又如孔颖达曰:“阴去故‘小往’,阳长故‘大来’,以此吉而亨通。”^{[3]101}此亦从阴阳二气消长而言之。否卦为消息卦中的消卦,即坤阴消乾阳,阳气收缩而阴气伸张,是所谓“阴消乾”“阴来灭阳”“阴信阳拙”。在这种意义上,“往”是说将要离去,而“来”是说即将到来,“大往小来”就是阳将要离去而阴即将到来,“小往大来”则是说阴

即将离去而阳即将到来。乾阳为万物生化动力之本根,乾阳到来意味着生机的显现、万物的交通、天下的安泰。相反,坤阴为万物肃杀收敛的原因,坤阴到来意味着生机的消退、万物的凋落、天下的失序。所以,从阴阳消息的角度上讲,泰卦卦象上坤下乾意味着“小往大来”,而否卦卦象上乾下坤意味着“大往小来”。同时,这种阴阳的消长也象征着君子与小人势力的盈虚进退。乾阳为生机,为君子之道;坤阴为杀机,为小人之道。泰卦乾阳滋长、坤阴消退,象征君子之道长而小人之道消;否卦坤阴滋长、乾阳消退,象征小人之道长而君子之道消。由此,自然意义上的阴阳之气的消长就与现实人事产生了关联,君子之道长则为治世,小人之道长则为乱世,所以泰卦为“通治”而否卦为“闭乱”。

而另一种理解是从泰否二卦之上下卦往来的角度来展开的,即将“通”理解为上下互通的“交通”。如荀爽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2]165}何妥曰:“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2]164}程颐言往来尤为明晰:“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4]63}三家之说基本相通,所谓“往”就是原本在下之地气上腾于外卦,“来”就是原本在上之天气下贯于内卦。泰卦因其阴阳相交合而通泰,否卦则正好相反,天气高居于上而继续向上,地气沉积于下且持续向下,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种不相交合的局面,即闭塞不通。上下往来既涵盖自然层面的天地之气的往来,又涵盖人事层面的朝廷君子、君子小人的往来。如程颐注泰卦时云:“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4]63}注否卦则曰:“夫上下交通,刚柔和会,君子之道也。否则反是,故不利君子贞。……阴柔在内,阳刚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来处于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4]69-70}按其所见,泰卦下乾上坤,乾阳象征君主,坤阴代表群臣,乾坤的往来象征着君臣之间推心置腹。而否卦上乾下坤,乾坤不相往来,如同在上之君与在下之臣不相往来。君臣相交,上下齐心,正是促使天下得治的关键所在;君臣不交,上下异心,统治集团内部不团结,天下便会混乱无序。同时,一卦之中下卦为内,上卦为外,泰卦乾阳下贯而坤阴上行,正如君子来居于内而小人退居于外,这便是君子之道能够亨通的景象。否卦则反之,小人来居于内而君子退居于外,二者各不得其应处之位,象征着君子之道闭乱的情态。持“往来”说的易学家不在少数,如朱子、朱震、吴澄、胡一桂、胡炳文、来知德等。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往来”说逐渐成了易学史上的主流诠释。

综上可知,先儒对泰否二卦卦义的理解大体是一致的,即将泰视为“通而治”,将否视为“闭而乱”。泰否的通泰与否不仅关乎自然层面的生化流行,也关乎社会层面的秩

序稳定。泰否二卦情态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泰否二卦内部阴阳往来之格局有不同,而对于阴阳往来的理解也有“消息”和“往来”两种思路。下面我们将分析船山《周易外传》对泰否二卦的诠释,并说明其诠释新在何处。

二、阴阳轮转视域下的定乱分立:船山对泰否二卦的新诠

与前人不同,船山在泰卦的取义上不取“通”而取“安”。《周易外传》言:“若是,则天地之方交,其象动而未宁,何以谓之泰乎?”又言:“苟欲求其不动者以为泰,是终古而无一日也。”^{[5]851}天地刚开始交通,一片混沌,阴阳感动而不定,船山认为这种情态不能称之为“泰”。在《周易内传》中船山对“泰”作了明确说明:“‘泰’,大也;安也;施化甚大而相得以安也。”^{[6]141}由此可知,船山不以“通”解“泰”,而以“安”解“泰”。在诠释否卦时,船山也不以“闭”解“否”,而以“乱”解“否”。

虽然《易传》以来对于泰否的诠释大多以“通”为切入点,但船山在《周易外传》中却以“定”为切入点。在他看来,泰卦符示的是阴阳往来过程中阴阳各安其居的安定态势,而否卦符示的是这一过程中阴阳不得其居的否乱态势。然而《系辞传》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在上,地在下,这是天地的固定位置,也是由一阴一阳之道所决定的“终古如斯”之定理。既然天地之尊卑终古而不可变易,那么《周易》视上地下天之泰卦为通泰的“交”,视上天下地之否卦为否塞的“不交”,这岂不是变易了终古不易之理而另立一道,即船山所谓“将易其所奠而别立道以推荡之乎?”^{[5]850}换言之,上地下天的泰卦格局为何能够被认定为“安定”之象?它是否与天尊地卑的基本原则矛盾?同理,天尊地卑本是自然之理势,为何说上天下地之否卦为乱世?既然泰否二卦所表征的天地格局与自然的天地格局是正好相反的,那么泰卦不同于自然格局的卦象被认定为“安泰”的原因何在?

船山解释说:“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5]850}道运转流行于天地乾坤之间,兼具显隐、备包有无、宰制群物。人对道的认识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人为依”的可见、可用、可知之道,另一种是“不以人为依”的不可见、不可用、不必知之道。从感官经验出发,乾下坤上、乾卑坤尊的泰卦格局确实与自然的天地分位不符,但从“兼可见不可见”的阴阳消长往来之视角看,看似在下的乾,实是将要到来的乾;看似在上的坤,实是将要消退的坤。船山举天体的运行为例:“今夫七曜之推移,人之所见者半,其所不见者半。”^{[5]851}日月五星从东方升起,运行于天穹,而在西方落下,这个过程是“以东为生,以西为没”的。但是诸星在西方落下后并不是从西方返回来向东运转,而是再次在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可见,天道运转是一种圆周运动,星体在西方消

失之后,在人所不能见的地方重新生成,运转半周再在东方升起。也就是说,人只能看到天道运转可见的部分,而不能通过感官去把握运动的全体。《思问录》有言:“天无度,人以太阳一日所行之舍为之度。天无次,人以月建之域为之次。非天所有,名因人立。名非天造,必从其实。”^{[7]448}自然的节律本身没有名字,是人按照节律之实际而命名的。由此说来,人从感性经验和生活实际出发所获得的自然运转模型,只是天道运转模型全体的一部分。而从兼具显隐的全体角度来说,无论是星象的推移还是阴阳的流转,其运动过程都是一种来而复往的圆周运动,在人之目力所不能及的幽微处,阴阳仍然存在并且继续运动。

由此,船山提出了阴阳向背轮转说:“夫阴阳各六,环转出入以为上下,而可见者六,不可见者六。可见之上,与不可见之下而相际;可见之下,与不可见之上而相际。”^{[5]851}卦并不是孤立自存的,当一个卦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有一个与其爻性相反的卦存在于其背后,与其共同组成一个六阴六阳的乾坤全体。我们所看见的六个爻所组成的卦,只是这一全体之“显”的一面,而其背后的卦是其“隐”的一面。显隐两卦的上爻和下爻是相交关系,两卦共同拼成一个环状结构并自下而上地轮转,是所谓“环转出入以为上下”。在这个意义上,船山认为“没者往也,生者来也”,又认为“往者往而之下,来者来而之上”。^{[5]851}在十二位阴阳轮转的过程中,在下之卦经过交接点向上轮转,在背之卦向前轮转,逐渐从不可见走向可见,是谓之“来”;在上之卦经过交接点向下轮转,在前之卦向背轮转,逐渐从可见走向不可见,是谓之“往”。泰卦之“小往大来”是说在上之坤将要向下转而“往”,在下之乾将要向上转而“来”;否卦反之,其“大往小来”是说在上之乾将要向下转而“往”,在下之坤将要向上转而“来”。而泰之所以为“大”、为“安”,在于它代表着乾阳的增长与坤阴的消退。乾阳为君子、为生机,坤阴为小人、为杀机,生机增进、杀机退却,自然是安定通泰之象。然而,从阴阳轮转这一模型来看,能够表现阳进阴退的卦不止泰卦,且泰卦之象“动而未宁”,那么,为什么只有泰卦能被称为“安定”呢?在船山看来,只有泰卦卦象最能明确凸显这种阳进阴退、生机到来的盛大景象。其言曰:“当泰之世,其可见者,乾下坤上也;不可见者,坤下乾上也。前乎此者为损,后乎此者为恒。”^{[5]851}泰卦背后有一否卦,泰否二卦上下相值而轮转出入,则泰卦之前一卦为损卦(上艮下兑),后一卦为恒卦(上震下巽)。^①《系辞传》云:“损,先难而后获。”又云:“恒,杂而不厌。”两卦均为爻象驳杂的不宁、不明之卦,不如泰卦之清楚明白,因而只有泰卦足以称之为“大”“安”。

否卦之所以为“否乱”的原因,也可在这一轮转过程中得到说明。乾阳健行于先而

^① 泰否相接而向上轮转,阴阳更替进入下一阶段时,处于背后的否卦初六将转进至泰卦初九,泰卦初九至六五向上移一位,从而变为恒卦之局势。损卦则与此相反。

催动、驱使、指引坤阴,坤阴顺承于后而配合乾阳造化万物,这个过程可以视为一个乾阳“命”坤阴的过程。问题在于造化无心、气化不齐,所以乾阳对坤阴的“命”不一定是“治命”,也有可能是“乱命”^①。船山之所以说否卦之命是“乱命”,是因为从阴阳轮转的模型来看,否卦是一个“阳进逼阴”的态势。如前所说,否卦背后隐伏一泰卦,泰否二卦并存而阴阳于此十二位中自下而上轮转。否卦坤下乾上,在上之乾占据四、五、上三位,位极于尊而健行不已。就可见的六爻之卦而言,四、五、上三爻继续向上已无位可容,将要由显转隐、进入不可见的领域。从兼可见不可见的十二位来说,否卦背后有一泰卦,否卦上卦之乾向上轮转将要侵犯原本居于隐地的泰卦上体之坤,同时,背后的泰卦下体之乾也将转向显地而威逼否卦下体之坤,即所谓“上无余位,既穷极而遁于虚;逼阴之都,又下侵而旷其应:皆命之乱者也”^{[5]853}。乾阳先行,坤阴从之,于是下体之坤“随行而蹶其迹”,整个卦象呈现为不可避免的“坤阴犯上”之势。一方面,乾阳将往,给了坤阴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背后将来之乾阳逼迫在下的坤阴不得不上行,造成了杀机将兴而生机衰敝、小人将兴而君子远离的“否乱”之象。一言以蔽之,否卦情态下,本居上位的乾阳自我隐遁而又迫阴太甚,造成了坤阴得势,天下失治。在这个意义上,乾阳对坤阴的“命”就是“乱命”,否卦之“否乱”也由此形成。

既然乾阳将去之时势无可改变,坤阴上行之势也是顺承乾阳将去而为,即坤阴“踵阳而继之,以相阳之不逮”^{[5]857},那么,为什么坤阴上进代替乾阳这件事会被视为“否乱”呢?船山认为,这是因为否卦之乾坤二卦的势力不同,乾阳已老而坤阴正壮。同时,坤阴“怀慝而善靡”^{[5]857},慝者恶念之谓,靡者易伏之谓,即是说坤阴自身不具备刚健贞固的德性,又怀有乘虚而入、篡权夺位的心机。从这种意义来说,乾阳交接坤阴是发于公心、由于正道,而坤阴交接乾阳则是包藏私心、图谋不轨。《周易》“许阳之际阴”,即是鼓励赞许乾阳主动与坤阴交接,但“不许阴之际阳”,即反对坤阴主动与乾阳交接。由于坤阴才能不足又动机不纯,所以坤阴上进取代乾阳便会导致否乱之世的形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船山不取程颐等人主张的“上下往来”说?换言之,为什么船山不以“通”为诠释核心?这可能是因为船山认为天地造化的过程虽然是一个阳唱阴和、阳施阴受的过程,但在此之间仍应明确区分乾阳和坤阴的主从地位。乾阳居于台前而引领坤阴,坤阴居于幕后而配合乾阳,由此完成天地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化流行,这是正常的态势。按“上下往来”说,坤阴下贯而乾阳上升就是“使四乘其居高极重之势,骤下而逼阳之都”^{[5]852}。换言之,在上之阴猛地向下冲击在下之阳,而乾阳因其

^① “乱命”原指人死前留下的遗言,因为人死之前神志往往不清,所以此遗言也往往是悖谬的命令。《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颖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颖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船山于此所言之“乱命”,即取“悖谬之命”的意思。

气轻而不敌坤阴之重,所以乾阳坤阴“纷拏互击”,不相配合且各不得安定,势成归妹之象而“无攸利”^①。所以,合理的乾坤关系是在下之乾阳推动坤阴回归其隐匿于不见之地的故居,使在上之三阴“迂回其径,率类以往,仍归乎其域,而效‘牝马之贞’矣”^{[5]852-853}。而那种坤阴下贯、乾阳上升,阴阳“相入以致功”的理解,实是要“强纳地于天中”,既忽视了乾阳坤阴各自的作用,也破坏了乾坤之间应有的主从关系,是不知乾坤之间“至密”而又“大辨”的几微之“际”。从船山之解释来看,他并不否定阴阳应和以生物的观点,只是强调要在二者生化的过程中区分清楚君臣主辅罢了。

总结来看,船山在《周易外传》中对泰否二卦的诠释既有对前人成说的批评,也有对传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批评的方面,船山没有采用前人常见的“上下往来”说,并且明确表示乾坤之气“迭上下而相入”的观点是抹杀“天地之际”的错误认识。在继承和发展的方面,他继承了汉唐卦气说视域下“阴阳消息”的理论,同时坚持宋明理学“明体达用”的基本精神,以本体论代替汉唐宇宙发生论,进而构建起全新的象数模型。该模型不存在阴阳之气的生成与消灭,只有阴阳在十二位结构中的呈现与隐藏,因而在形而上学的思辨性上较之于汉唐旧说推进了一大步。

三、严明大防,全身全道:船山对泰否二卦形势下君子自处之道的思考

《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模拟分析阴阳变化之道指导现实人事,船山对泰否二卦的理解也不只是对阴阳格局的分析,更要从中寻找君子自处之原则、待人之道理。既然泰否二卦区别于其他诸卦的关键之处在于此二卦是阴阳各从其类而相交接进退,因其交接进退的合理与否而各成一格局,那么,船山对君子自处之道的讨论就是围绕乾阳坤阴、君子小人如何交接而展开的。船山认为,在泰卦之格局下,君子应该明辨君子小人之际而不淆乱;在否卦之格局下,君子应该俭德避难而自正性情。下面将分别予以说明。

泰卦卦辞云:“小往大来,吉亨。”“小往大来”一方面标示着乾阳生机将来而坤阴杀机将往,另一方面也标示着君子之将得位而小人之将退去。但在这乾阳推动坤阴的过程中,阴阳之间存在着“至密”而“大辨”的“际”。船山云:“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终不可使其际离焉,抑终不可使其际合焉。”^{[5]852}所谓“至密”,是说阴阳天地之间相亲相比,不能在物理层面上明确找到二者的分界点。所谓“大辨”,是说阴阳天地虽然相亲相比,但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功效各异的存在。阴阳不可不使之和洽至密,否则天地造化之功用便无从谈起;阴阳亦不可使之泯灭分别,否则天地造化就会混乱失

^① 归妹卦可视为泰卦九三和六四互换,其卦辞曰:“征凶,无攸利。”

序,是所谓天地之际不可离亦不可合也。于理而言,天地之际不可离亦不可合,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分际实在是微妙至极。在种种关系中做到完全不逾矩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比邻而居难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夫妻晏居休息时也有可能出现看似无害的越礼。^①正因为“辨不易昭而密难相洽”^{[5]852},所以船山认为与坤阴相交接的乾阳必须具有“艰贞”之德,否则就会有乾坤阴阳混淆失序的危险。“艰”表明了这种交接的艰难不易,“贞”是说在此交接之时乾阳必须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本来之分位,端正自身,健行不已,与同类之阳为伍,拒绝坤阴的引诱而坚定地驱使其返回其应处之“隐”位。由是,君子小人之界限不相淆乱,阴阳时位的交接平稳完成,乾阳坤阴各得其所,泰卦之“治”得以实现。

总体来看,船山认为在泰卦的格局下君子占据有利地位,可以积极推动通泰治世的形成。但否卦的格局与泰卦不同,船山在讨论否卦时转换了一个视角,认为否卦格局已成之后君子应该俭德避难,自正性情,不宜积极有为。船山指出,消除否难不能等到否乱格局形成之后,而只能在否乱格局形成之前。“来者往之反也,而来之极则成往。欲其不往,则莫如止其方来。”^{[5]854}在否乱之势已成情况下再想扭转局面,不过是个人玩弄智谋诈巧的小聪明,如同“覆稻舟于彭蠡,而求余粒于蚌蟹之腹”^{[5]854}一样颠倒荒诞。既然已成的否乱之势不可轻易改移,那么,君子所谓“用否之道”就不是主动出击扭转局势,而只能“俭德避难”“无施而可”。

船山在《周易外传》中对君子出处去就之事有言:

乃不有其避难之时乎? 避难者,全身者也;全身者,全道者也。道为公,德为私。君子之于道,甚乎其为德,而况禄乎? 且夫禄以荣道,非荣身也;荣以辱身,斯辱道也。故俭德而固其一,禄不可荣而塞其情。固其一,他非吾德也;塞其情,道无不荣也。虽有不忍万物之志,亦听其自为生死而吝吾仁;虽耻以百亩不易为己忧,亦安于降志辱身而屈吾义。^{[5]855}

从儒家传统价值观来说,君子的心里必须怀有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天下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君子应当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的政治活动而有所为。如果君子的心里没有天下意识,那么就是“绝天下于己”;如果君子心里有天下意识却不抓住机会投身于政治活动,那么就是“绝己于天下”。然而,尽管君子入世之心迫切如此,其出处去就仍然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为。如果天下政事无道,否乱之世已成且无可改移,那么君子就应该“避难全身”,不得不“绝天下于己”和“绝己于天

^① 《周易外传》云:“孰使比邻而无瓜李之嫌? 孰使晏寝而无榱桷之乱?”(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52页)榱桷本义指挂衣服用的竿架,《礼记·内则》曰:“男女不同榱桷,不敢县于夫之榱桷,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这是说夫妻之衣服应该分别挂于不同的衣架,然而生活中挂衣服时未必会分得如此之清楚,难免出现混挂的现象,是所谓“榱桷之乱”。

下”。虽然从本心上讲,君子不忍看到天下万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考虑到自己并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那就不得不“听其自为生死”“安于降志辱身”了。

船山对儒者个人生存、社会地位和所载之道三者的关系也有独特的理解。他说:“避难者,全身者也;全身者,全道者也。道为公,德为私。君子之于道,甚乎其为德,而况禄乎?且夫禄以荣道,非荣身也;荣以辱身,斯辱道也。”^{[5]855}儒者之所以要隐居避难,是为了保全个体生命,而保全个体生命是为了留存文化的火种,期冀将来能够重新发扬千百年来流传的圣人之道。国家与民族的存续绵延不在于政权的兴替,而在于文化的传承。船山云:“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8]346}对儒者而言,保全大道是第一位的,个体生命与社会地位都应为这一任务服务。因此,如果时势极其恶劣,儒者就应该以保全大道为先而不得苟且偷生,不应该为了所谓的“德”或“气节”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综上,船山的观点与明末在极端道德理想主义风气影响下产生的“以死保节”之观点存在显著差异。明清易代之时涌现出大批死节的士大夫,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大学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绝食而亡的刘宗周。在刘宗周看来,儒家的生死观与佛老的不同之处在于儒者的生不仅是个体身躯的生,还是在天地万物、大化流行中的“俱生”,即人之生是天地之生的一部分。由此来看,个体之生并不具有多么伟大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超越于个体之生的天道之生。如果将个体的生命看得太重,那就会将个体与万物割裂开来,是所谓“看得一身生死事极大,将天地万物都置之膜外”^{[9]290}。此言固然彰显了宋明理学天人一体的宏大规模和崇高境界,但它在标举天理或天道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贬低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之生命的价值。换言之,这是以感性生命“殉”理性精神。而儒学的“生生之德”首先表现为对每一个实存之个体生命的重视和肯定,如果我们沿着刘宗周,亦即宋明理学的既有传统推演,就会有漠视个体生命的“以理杀人”的危险。而船山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强调,恰恰弥补了宋明理学这一传统的潜在缺陷:个体的生命本身就是天理或天道的承担者,天理或天道需要在个体生命的存在中彰显,因此学者的生命不能轻言放弃,尤其是当杀身不能成仁、舍生不一定合义的时候。在这里,实存的个体生命与超越的道德原则之间存在着价值层面的沟通,殉节也不是朝代更迭时学者的唯一或第一选择。

明清易代之后,士大夫一般有三种选择:第一是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成为死节之士;第二是与新朝合作而成为顺臣;第三是做一个既不选择死节也不与新朝合作的遗民。如果说船山对死节持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的话,那么,他对委身于异族而获得荣华富贵的民族叛徒便只有无情地批判了。在船山看来,当时异族以侵略者的身份入侵华夏,异族政权与华夏民族便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因而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投奔异族政权就是不

折不扣的投敌行为。对船山而言,明清更替是一件天崩地坼的大事,这种“亡国”之痛决定了其态度和立场,这从《周易外传》对否卦的诠释中可见一斑。

结 语

王船山在《周易外传》中对泰否二卦的诠释,消化吸收了汉唐卦气说的理论传统,又在形而上学层面予以进一步推进,将其发展为言“幽明”而不言“有无”的阴阳轮转模型,并对易学史上盛行的“上下往来”解释作出了颇有新意的批评。船山对泰卦君子之道的发明和对贰臣的批判,既保持了儒家名节观一贯的崖岸高峻,也有对明末道德理想主义极端化、严峻化倾向的深刻反思。总而言之,船山《周易外传》对泰否二卦的诠释发前人之未发,体现了船山不囿成说的创新精神、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意识和沉郁顿挫的遗民情怀,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周易》经传及船山哲学的理解都有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班固.汉书: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宋本周易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8.
- [4] 程颐.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
- [5] 周易外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 [6] 周易内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 [7] 思问录//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 [8] 读通鉴论//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 [9] 语类//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编校:龚江兰)